

国务院正式批复 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张兴旺

据“雄安发布”微信公众号28日消息,日前,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在此前一日河北省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河北省表示,中央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标志着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新阶段。

对于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表示,新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加紧入驻、落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工程机械行业获利好。白洋淀修复治理需要相关的环保设备,能带动生态修复治理相关产业。在公共服务方面,学校、医院等配套产业将得到发展机会。

料成中长期投资强主题

12月27日,河北省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会议强调,要举全省之力,全面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向纵深发展。一要着力完善雄安新区规划体系,把每一寸土地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二要积极出台配套政策,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有力政策支撑。三要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四要扎实稳妥推进征迁工作,切实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五要加大交通、绿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力度,切实治理和保护白洋淀生态环境。六要加强对科学管控,确保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东兴证券分析师宋劲认为,预计雄安新区在2035年将成中国基建、环保投资体量最大、创新优惠政策最多和发展重视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地,有望成为中长期的强主题。

三条投资主线明晰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认为,对于资本市场投资,雄安的机会体现在未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中,更重要的是看到雄安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新思路,包括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视、人与环境的新型关系、新型政企关系等。

多位券商分析师指出,在现阶段,环保、基建及新兴产业将成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三条投资主线。

申万宏源研报指出,《河北省重点项目提质增效年活动推进方案》显示,今年雄安新区总体投资规模在3000亿元左右,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两大方面。其中,超过2300亿元的投资集中在铁路、公路、排水、生态修复、拆迁安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华创证券认为,预计雄安基建投资规模约为2380亿元,其中高铁建设约2000亿元,考虑到建筑材料具备运输半径限制,京津冀本地基建企业有望受益。

专家指出,打造绿色雄安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环保、绿化、节能。华创证券预计,生态环保工程投资约558亿元,其中水务投资220亿元,京津冀本地环保企业有望受益。

此外,新兴产业也是雄安新区发展的重点。河北省副省长、雄安新区管委会主任陈刚近日对媒体表示,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安静的背后,其实是精心打造支撑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这为雄安新区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开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未来在新兴产业方面,雄安将率先大规模商用5G、率先布局IPv6;交通方面,雄安将建立连接京津及周边其他城市、北京新机场之间的轨道交通网络,形成与外部连通的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网。

证监会核发 3家企业IPO批文

□本报记者 徐昭

证监会28日消息,证监会近日按法定程序核准了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和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的首发申请。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文件。

深市可转债可交换债 改为单账户申购

□本报记者 黄灵灵

近日,深交所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和《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进行了修订,将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可转债”)和可交换公司债券(简称“可交换债”)多账户申购改为单账户申购,并优化可转债发行上市业务,进一步落实《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述规则自2018年12月28日起施行。

目前,可转债和可交换债发行实施信用申购。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提高投资者网上信用申购的公平性,确保网上信用申购违规惩戒机制执行的合理性,有效约束投资者网上申购获得配售而不缴款的失信行为,本次修订明确了投资者参与可转债、可交换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此外,为提高可转债产品的市场吸引力,提高发行成功率,深交所对可转债发行上市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并进一步缩短可转债发行结束至上市的时间间隔。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完善主权养老基金制度安排

专家建议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

□本报记者 徐昭

12月28日,多位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8》发布式”上表示,中国仍处于外汇储备的积累期,且积累规模相当可观,中国应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适时建立起一只“外汇型”的主权养老基金,用于未来老龄化高峰的补充。

迎最佳建立时机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8》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各国都非常重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并不断拓展投资领域。

“目前,中国的主权基金虽有两只,一只只是主权养老基金,另一只是主权财富基金,但在外汇储备十分充足的条件下,决策者应为未来人口老龄化做准备,未雨绸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养老专业委员会顾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尽管这两年外汇储备规模略有回落,但总体来看,中国仍处于外汇储备的积累期,且积累规模相当可观。中国应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适时建立一只“外汇型”的主权养老基金,补充未来的老龄化高峰。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8》指出,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加之国际贸易摩擦的升级,中国刚对外汇储备的高峰期,不仅具备了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条件,而且略显紧迫性。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期,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窗口有可能越来越小,历史的重要节点有可能稍纵即逝。

从国际实践来看,郑秉文认为,社保政策的制定、社保新政的推出、社保制度的推进等,往往在经济上升时期和经济危机时期。所以说,目前是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最佳时机,中国不应错失良机。

弥补养老保障体系短板

“如果能抓住机会,建立一只‘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或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将会获得一举多赢的功效。”郑秉文建议,

中国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还需几十年的努力,因为“积累型”的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需要全面深化税制改革,没有税改的配合,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参与率不可能有根本性变化,基金积累和储备就不可能有实质性变化,养老保障就只能靠第一支柱。如果用一部分外汇建立一只“外汇型”养老基金,可在短期内弥补这个短板,迅速提高养老基金储备总额。

郑秉文表示,第一代外来务工人员接近或已经退休,作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的主力军,他们为出口创汇做了巨大贡献。建立一只“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将其视为分享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举措。同时,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有利于外汇储备的投资体制多元化。

此外,《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8》指出,多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始终承担着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其他外汇资产经营管理的责任。但是,要实现主权财富积极主动的管理方式,以适应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趋势,同时防止中国投资威胁论,任务十分艰巨。

进一步壮大主权养老基金规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均衡代际负担、体现制度公平,进一步优化主权养老基金规模,增强发挥战略储备基金的能力非常必要。”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表示,要完善基金投资政策,更好地促进基金保值增值。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基金收益率。

郑秉文建议,主权养老基金投资资本市场利国利民,是完善社保体制的重要举措,应夯实长期投资和主动管理的理念,在对大类资产的投资比例实施监管的同时,适度放开对投资品种的限制,适当扩大投资范围和境外投资的比例。

“在养老金投资管理方面,既要重视投资对养老金保值增值的作用,也要重视养老金对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让老百姓通过养老金投资,分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蓉认为,此外,应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让老百姓不仅对养老有概念,也对投资有认知,了解养老金不等于“保本保息”,正确理解风险与波动,建立长期投资理念。



图片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17省市委托投资运营养老金 共到账6050亿元

□本报记者 费杨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副局长汤晓莉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主权养老基金的发展要研究解决四个方面问题。

汤晓莉称,目前,我国委托投资的基本养老金有三类。按照时间起始顺序来排,第一类是从2006年开始,天津、山西、吉林、黑龙江、山东等九个省市委托投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做实个人账户的中央财政补助基金。第二类是广东从2012年开始,山东从2015年开始,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的各1000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第三类是按照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要求,各省委托投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截至目前,一共是17个省市委托投资运营的资金,合同总金额是8450亿元,到账资金是6050亿元。

对于中国主权养老基金的发展,汤晓莉认为,目前要研究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委托规模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运营的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委托投资模式问题。她说,目前委托投资的17个省份都选择了承诺保底收益、五年委托期的合同形式。未来,委托投资要逐步扩展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考虑怎样针对这三类养老保险基金各自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委托模式,给地方更多的选择权、更好的激励导向。

三是投资回报问题。她说:“目前中国的两笔主权养老基金都是由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运营,但这两笔钱对资本市场波动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多年来只进不出,投资期限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五年一个委托期,委托省份对每年的投资收益都高度关注,对资本市场的波动容忍度明显低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如何在当前的这种投资环境下取得高于市场平均回报的收益,是对社保理事会和监管部门的考验。”

四是使用分配问题。2016年通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里明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四十年后来看桥——重庆掠影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 姜洋

尽管30多年前离开重庆后,也经常出差重庆,但来去匆匆,很少细品重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

最近又去重庆,下榻江北嘴,面对朝天门。一大早,淫雨霏霏中沿嘉陵江散步,细观两岸重峦叠嶂的建筑,下半城的吊脚楼一扫而空(抗战时期下江人逃难时盖的简易房屋,用木头依山沿两江而建)。一时间,陈事旧物,直闯脑门。那时,出菜园坝火车站,极目望龙门,吊脚楼啦啦跑来眼底。从旅游角度看,那消失的吊脚楼可是重庆的一景啊!只是好看不好住,我有同学的家就在这种建筑里,我上去过,走起来摇摇晃晃,听起来叽叽咕咕,怪危险的。远眺江上,发现两江上有太多的桥,扫眼过去,嘉陵江这边就有三、四座,长江那边也有好几座,有的还是双层桥,上汽车,下轻轨。我查百度数据,2017年重庆市城区内有27座桥,可30多年前重庆市区仅有两座分别架于长江上的重庆长江大桥和嘉陵江上的嘉陵江大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取得成功后,改革向城市迈进。在我国大城市的综合改革中,最早踩下脚印的就是重庆人。30多年前,我是经济日报驻重庆记者,亲眼目睹并记录了重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风风雨雨。写过一些文章。往事并不如烟:1984年6月,重庆自告奋勇提出试点厂长负责制,市委政府确定了28家企业首先试行厂长负责制,试点效果很好,重庆市委政府迅速向全市推开。一年后,重庆已有394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它们的产值和利润分别占重庆市的80%。1986年3月,经济日报刊登了我的《路,是这样走过来的》通讯稿,记录了我这历史。1986年重庆钢铁公司在全国首家发行企业债券,采取了直接融资方式,探索性地改变了中国过去只能向银行贷款的传统融资模式。这个经验被我写成《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一文。1987年重庆饭店中外合资,重庆热情邀请美国人邓贝来当总经理,后因意见不合邓贝被中方大股东解雇,此事反映了我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不适应,为此我写了《洋经理在改革中是否被辞退?》一文,见报后引起讨论。1988年“价格闯关”中的“双轨制”弊端突出,为此我写了《一个“倒爷”向市委书记透露秘密》的对话录等等。这次故地重游,细看重庆增加了这么多的桥,才觉得我在30多年前发表于经济日报《桥,山城人的希望》这篇文章,把桥作为重庆人的希望提出来,没有太跑调,自认为还是抓住了当时重庆经济民生中的关键问题。

重庆桥的历史变迁,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过去重庆桥太少,记者在全市采访很费劲。长江和嘉陵江把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半岛与江北区和南岸区分割开来。两岸的人,相互往来,天锁锁钥,要么过桥,要么摆渡,十分艰难。和全国一样,那时重庆也穷,没钱修太多的桥。因此,不仅是我们采访不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非常不便。

那时重庆仅有两座桥,一座是1966年建成通车,从渝中区上清寺连接北区新华街的牛角沱嘉陵江大桥,过去就叫嘉陵江大桥。一座是1980年建成通车的重庆长江大桥,连接渝中区石板坡和南岸区南坪,现在叫石板坡长江大桥。在仅有两座桥的年代里,两岸都是我当年采访经常要跑的地方。还记得40年前重庆长江大桥建桥时有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说是著名雕塑家叶毓山等人为大桥做了一组以男女人体方式表现春夏秋冬的雕塑,采取了裸体的人物造型。这组雕塑的设计稿稿一经公开,舆论哗然,议论纷纷。那时大多数人难以接受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怎么能让人不穿衣服就站在桥头呢?”,“多羞人”!最后,经过雕塑家刘开渠、美学家王朝文等组织专家讨论。作为妥协,艺术家们被迫给这组雕塑套上一层“薄纱”,算是披件衣裳,蒙一下羞,雕塑才得以落成。如今,这些曾经裸体的人物仍然披着“薄纱”坚守桥头。

重庆交通不便古已有之,但有水码头。李白早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长叹,也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惬意。18世纪重庆开始建造外省商人聚集的会馆,有湖广会馆等8省之多。19世纪末,英国人顺长江进入重庆并开埠,山城成为商业贸易大码头。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卢作孚的船队通过川江抢救战时物资大撤退(重钢的张之洞洋务运动时期的“汉阳造”等设备,就是从武汉抢运到重庆的)。新中国的60年代,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重镇,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从外省转移来一批军工制造业。重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怀于两江之间,可凭借天险拒敌于千里之外。易守难攻,偏安一隅的重庆,交通不便也许是个体有利因素。但改革开放后,这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极为不利的条件了。重庆想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积极争取改革开放走在前,勇立潮头敢为先锋。1983年,重庆市被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为第一家计划单列城市,在四川省辖下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由此,重庆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中央

希望重庆在改革中大胆往前走。1984年经济日报把我从北京派到重庆常驻,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采访报道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向全国推广。

前面提到那篇关于重庆“桥”的报道,是有感于重庆基础设施落后影响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作。回想起1988年底参加重庆第三座桥的通车典礼场景。在一个霏霏细雨的早上,重庆市党政领导几乎全部都聚集在一座刚刚落成的大桥上,参加那个历时三年建设、投资1.1个亿的嘉陵江石门大桥通车剪彩仪式。当下的年轻人也许会问,重庆市区今天已经拥有20多座大桥,那段往事何以值得如此这般隆重?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重庆过去的历史,在国外有较高的知名度,因而成为计划单列市后,许多外国人纷纷来重庆考察投资。采访中我听到最多的是他们对重庆基础设施的抱怨。当时来重庆考察商机的一位叫法·比恩的美国商人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她说:在重庆生活很不容易,交通太不方便了,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西方价值观念里,重庆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当时重庆的一位官员说,重庆特大的城市,狭小的交通,不知挤走了多少兴致勃勃而来的投资者。没有起码的投资环境,留不住人。桥,是畅通重庆交通网络、发展经济、促进贸易的关键。因此,在参加了上面说的大桥剪彩仪式后,我迅速写出了《桥,山城人的希望》的通讯,经济日报在1989年1月10日头版刊登了。第二天《重庆日报》在一版全文转载,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为什么当地报纸这么看重这篇报道?我估计是,这篇文章说出了重庆人的心声。因为作为“两江夹半岛”的山城重庆来说,桥,对于沟联交通、畅通物流、发展经济、方便民生太重要了。我在文中写道:“它的修通连接了重庆市区被天堑隔断的汉(口)渝公路和成(都)渝公路,沟通了重庆这个半岛型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形成了重庆市交通网络的西半环。使过去要绕行16公里的车辆可以长驱直入,1年仅节省汽油的价值就达6830万元……。这座大桥通车的意义,远不在于经济上,而是在它的象征意义上:它的建成通车表明重庆市政府为彻底改变重庆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状态决心开始得以体现”。重庆在建设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资金筹集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通过市场来进行了,这在30多年前是有改革领先意义的探索。当初重庆迈出的第一步,属于“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们实行城市基础设施的有偿使用,向社会筹集建设资金。尽管那时候看法各异,争论不止,但重庆市政府还是尝试着迈开了步子。我写道:“从1985